郑振铎与“五四”以来的中外文学交流

朱文华

【摘要】本文拟着重探讨郑振铎先生（1898－1958）在“五四”以来长期从事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所形成的三大鲜明个性特点，即：“有计划的介绍”外国文学；把译介对象提升到对其作研究的层次；注重交流的双向性。 本文进而探讨上述特点所形成的深层的思想原因：当年的郑振铎较之他同时代的新文学家，因坚持独立思考而可贵地形成了辩证的文化理念，即在坚持文学的一体观（即“文学的全球化”）的同时，保持对于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

【关键词】 郑振铎 “五四”新文学运动 中外文学交流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文学革命（或称新文学运动）所带来的中国文学的进步，其主要标志之一，在于造成了一个自觉的而又有重大成效的中外文学交流的局面，由此促进了中国文学迅速地实现现代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郑振铎先生（1898-1958）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更为突出，更何况他后来又是为崇高的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事业而以身殉职的。

本文拟着重探讨郑振铎在长期从事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所形成的鲜明的个性特点，以及形成的原因。这是因为，认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做好中外文学交流的工作，有着切实的启示意义。

一、“有计划的介绍”

虽然郑振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触带有偶然性和局部性，——他于１９１７年中学肄业后从故乡来到北京，次年初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因课余常去该校附近的基督教北京青年会的一个小小的图书室读书，才得以接触一批外国文学作品（包括苏俄文学的英译本），在深感兴趣之后，即着手翻译介绍俄国文学，由此走上中外文学交流之路。但是由于他敏锐地认识到，“我国介绍欧美文学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却从不曾有过有计划的介绍，往往都是随手抓到一本便译，或为流行的观念所拘束，往往费了很大的力量只译些二三流的著作”。[1]因此，当他 1921 年初毕业后以改行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为契机而义无返顾地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结合自己的职业活动，有意识地积极地对开展中外文学交流工作，并且辨证地做到：一方面尽量地打开窗户，拓宽渠道，以扩大译介面，另一方面又充分注重这种译介工作的计划性，既力求介绍的全面系统，又特别关注所译介的作品本身的高水准与高品位。试看郑振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两个十年间（1917-1937）所做的的几项重要工作：

（一）在 1921-1929 年间先后主编或参与编辑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后曾易名为《文学》和《文学周报》) 期间，充分重视对于世界文学的译介。据有人统计，这一系刊物先后总共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 282 篇，[2]译介面无疑是很广的。

（二）在 1923-1929 年在接替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依据“文学研究会简章”所提出的“研究世界文学”的旨趣，更是采用多种新鲜活泼的形式译介世界文学。据统计《小说月报》自 1921 年革新以来至 1929 年终刊，共译介了 39 个国家的 304 位作家的作品 804 篇。[3]但重点则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那些真正的“名家名著”，如在中国文学界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一批“专号”（重要的有“泰戈尔专号”、“拜伦纪念号”、“法国文学专号”、“安徒生专号”、“罗曼罗兰专号”等）。

（三）在 1921-1931 年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编辑出版文学小丛书的工作期间，又有计划地编辑出版了“共学社丛书-俄国戏剧集”和“共学社丛书-俄罗斯文学丛书”，而同时编辑出版的“文学周报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和“小说月报丛书”等，也收有多种外国文学（含俄-苏文学）的译本。上述几种丛书中所收的外国文学（含俄-苏文学）的译本计有近百种之多；这些译本在短时间里的集中出版，既形成了系统性，又突出了重点（俄-苏文学），由此为适应当时的中国新文学界学习借鉴外国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经验的需要而提供了基本的文献资料。

（四）在 1926-1927 间年编撰出版的《文学大纲》一书中，对世界文学的介绍更为全面和系统。全书分为四大卷共四十六章，首章以《世界的古籍》为题作概述，从第二章开始即上溯古希腊罗马文学，以后则按时间与地区（国家民族）的划分，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地区（民族）的重要文学遗产分别予以介绍，其中对欧洲十九世纪文学的伟大成就尤为推崇，末章则论及 20 世纪初的世界文学走向。从内容体例看，该书对于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均作生平简介，而对于各本名著，既有故事梗概的复述，也对之作出简要的评论性意见。这样，全书不仅富有较浓的文学史色彩，而且还具有世界文学辞书的性质，一册在手，使得当时的中国读者，可以对世界文学史概况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了解与认识。

（五）郑振铎在编撰《文学大纲》时曾产生过编辑《世界文学》（季刊）的设想，“将于五六年之内陆续介绍三五十种的世界大著进来”。[4]这一计划于 1935 年在他主编大型丛书《世界文库》期间初步得到了落实，到次年 4 月，《世界文库》总共出版了十二册，外加十五种单行本。在这批精心选择介绍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长篇的世界名著有[西]塞万提斯的《吉珂德先生传》、[俄]果戈理的《死灵魂》（第一卷）、[希]波卢塔的《希腊罗马伟人传》、[英]C-白朗底的《简爱自传》等；短篇的则有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霍桑（以上法国）、梭罗古勃、托斯退夫斯基、高尔基（以上俄-苏）、渥兹华斯、哈代（以上英国）、马克-吐温（美国）和海涅（德国）等人的诗文。可以说，随着《世界文库》的编辑出版，“五四”以来的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被提升到了新的阶段与水平。

（六）郑振铎本人的译述外国文学的工作，更有明确的重点，这主要是：俄-苏文学以及印度现代文学。如在俄-苏文学方面，据笔者统计，他在 1921-1936 年期间，通过翻译作品、撰写作家传记、以及为他人的译著写序等形式，总共向国人推荐介绍了契珂夫、阿志巴绥夫、安特列夫、克雷洛夫、、梭罗古勃、史拉美克、路卜询、普希金、托斯退夫斯基、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以及高尔基等 13 位优秀的苏俄作家作品，据有关资料，[5]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前后（1917—1929-3），被着重译介到中国的俄-苏主要作家计有 21 人，而郑振铎所译介过的上述 13 人均在其列，有的还是为郑振铎所唯一作译介的，如史拉美克的剧作《六月》。这充分表明，郑振铎的译介确实是有眼光的，也为当时的俄-苏译介工作作出了贡献。另外，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郑振铎对于印度著名诗人、亚洲的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作品的译介更是不不遗余力：不仅最早作译介，而且译介得最多——共选译了 500 余首，并先后辑为《飞鸟集》、《新月集》《泰戈尔诗》等三本集子，由此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最显著。

很显然，这种有计划的译介，包括译介内容对象选择上的点与面的结合，表明郑振铎自觉地从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入手而从事中外文学交流，有着深层的文化思考，即从发展中国新文学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重点的介绍具有显著的异质新质的、且可为中国新文学创造所师法的那类外国文学作品。当年郑振铎在谈到为何着重译介俄-苏文学的原因时指出：“俄罗斯的文学是近代的世界文学的结晶。现在能够把俄国文学介绍来，则我们即可因所得见世界的、近代的文学真价，而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也可以在此建其基础了”，[6] 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把译介工作提升到对之作研究的层次

中外文化交流史表明，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凡能够切实开展文学交流的，往往并不满足于单纯的译介工作，只有把这种单纯的译介工作提升到对之作深入研究的层次，方才可以使得文学交流开始产生正当的文化影响。。

郑振铎对此也有深切的理解与认识，并付诸实践。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于译介对象的研究，努力做到把译介工作建立在对之作精细研究的基础上。唯其如此，他对某些外国文学的译介，事实上体现了当时的中外文学交流的最高水平，而这对于外国文学经验的参照系在中国新文学界的确立，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方面最典型的情况表现在他对俄-苏文学的译介问题上：1920 年初，我国新文学界对俄-苏文学的译介形成了第一个热潮，虽然郑振铎当时也发表了若干译作，但相比其他人更热中于翻译作品的情形，他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俄-苏文学做整体的基础研究方面，并先后发表《俄罗斯文学底特质与其略史》、《现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和《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和影响》等重要论文，在国内首次全面、完整、系统地对俄-苏文学的总风貌与总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介绍。以此为基础，稍后郑振铎更是撰写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俄-苏文学研究的专著《俄国文学史略》。[7]由此切实地推动了方兴未艾的中俄（苏）文学交流，诚如当年有人所评论的那样：“此书能用页数不多的本子，将俄国文学的历史上的变迁及其重要作家的风格、思想，有梗概的叙述。可谓近年来论俄国文学的最好的小册子”。[8]

另外，关于郑振铎把译介工作提升到对之作研究的层次，由此促使外国文学经验的参照系在中国新文学界的确立，并且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问题，还有一个显著的实例，即：正因为郑振铎对泰戈尔诗歌的译介，同样建立在对原著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而且在翻译过程中，他还进一步融入了关于诗歌翻译理论问题的研究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如强调成功的文学翻译，“不仅是要译文能含有原作的所有的意义并表现出同样的风格与态度，并且还要把所有原作中的‘流利’(ease）完全具有。”[9] 受此影响，当时国内的一批文学青年即纷纷学写泰戈尔式的诗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五四著名新文学家冰心得以脱颖而出，——据冰心后来回忆说：“那是 1919 年的事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后来看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10]其结果就是中国白话新诗名著《繁星》与《春水》两本集子的问世。

三、注重交流的双向性

近代以来的国际文学交流中，事实上还形成了这样一条历史经验：文化交流的双方本是平等的，理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以达到各自取长补短、融合创新之效。所以，理想的成功的文学交流，不应只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的“拿来”与引进，而应该是双向的，即双方间你来我往，互通有无。

应该说，在“五四”以来的中外文学交流中，作为中国的新文学家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付诸实践的，郑振铎的表现相对说来是最为突出的。例如：

在《文学大纲》一书中，他对“世界文学史”的整体把握，明确地屏弃了一般西方学者所服膺的“西方中心论”，而是对东方国家（地区、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尤其是中国的古代文学的伟大成绩）表现了同样的尊重和推崇；同理，在编辑《世界文库》丛书时，他本着“努力于表扬真实的名著”[11]的立场，也对中外文学一视同仁。所以在重视西方文学经典的同时，除了刊发被他誉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骄傲的两部大著作”[12]《红楼梦》与《金瓶梅词话》外，还对民族传统文学中的富有特色的东西（如唐宋传奇、元代杂剧、敦煌变文等，以及《沧浪诗话》等文学批评论著，乃至王梵志的白话诗和无名氏的作品等），也予以大量介绍重刊。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郑振铎发觉海外学术文化界因种种原因而对中国文学有所不当认识的时候，更是急切

地予以纠正，他还以此为契机，鞭策本人对民族传统文学做更深入的研究，力争以自己的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中外文学的双向交流作出切实的贡献。

例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郑振铎获读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Giles，1845-1935）所著的《中国文学史》(1911 年出版)。在郑振铎看来，这本当时属于英语国家中唯一的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学术专著，“有地方未免太误会了，有许多地方并且疏漏得利（厉）害”，而“滥收”和“关于作家及作品的批评的不合理，与事实上的小错误”等更是比比皆是，“如果任他以讹传讹，则中国文学恐将要受不少的误会了”。[13]因此，郑振铎在撰文对此公开地予以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外，还郑重提出：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够做出本英文的《中国文学史》矫正他的错误，免得说英文而喜欢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永远为此不完全的书所误。”[14]

可惜当时尚无中国学者能够撰写英文本的《中国文学史》，退而求其次，郑振铎又提出：中国学者应先写一本“比较完备些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其至少做到“(一）文学上的完全知识；（二）中国文学研究的片段的研究的根据”。[15]然而，多年过去了，直到抗战前后，实际上真正地认真动手来做这一工作的，还是郑振铎本人。——这就是他在三十年代撰写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16]以及相关的几本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集如《中国文学论集》和《佝偻集》等。[17]以上这些论著的发表，很快获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如日本学者长泽规矩评论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引用的材料既新鲜又丰富，在观点上又不墨守旧说，不像王国维那样拘于儒家之见，而是突破了传统的旧套。[18]事实上，直到 1957 年，郑振铎应邀先后赴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讲学，讲学内容还是以他的上述研究成果为主。应该说，至今看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仍是一部富有学术创新价值的优秀之作。[19]

由此可见，从“五四”时期到三十年代的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最注重双向交流的，即在积极译介外国文学的同时，又不忘主动地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的，郑振铎其实是最杰出的一位。换言之，在这方面，郑振铎以个人之力而作出的独特贡献，尤其值得我们肯定。

四、两条重要的文化理念

毛泽东同志在回顾总结“五四”新文学（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的时候曾经指出：当时的人们普遍存在着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即“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20]这一点在对待中外文学遗产的问题上，可以说曾经表现得特别明显。然而，作为同是“五四”一代的新文学家的郑振铎，为什么能够避免这种形而上学，从而主动自觉地坚持开展双向的中外文学交流的活动呢?

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是由郑振铎独特的思想文化个性所决定的，换言之，当年的郑振铎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素养、而又敢于积极追随世界文化潮流、并理性地服膺于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价值的近代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青年，因坚持独立思考而可贵地形成了两条重要的文化理念。

一是文学的一体观，即抛弃任何偏见，不搞多重标准，以“纯文学”的眼光审视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学作品及其社会功用，用他的话来说：“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21]文学的“使命就是：扩大或深邃人们的同情与慰籍，并提高人们的精神。------救现代人们的堕落，惟有文学能之。”[22]由此出发，他认为，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互通的：“文艺是没有国界的。印度人的一首恋歌，被远在冰岛的人民读之，也如出自他们自己之口似的同样受感动；北欧人作的一篇故事，不同种类不同俗尚的日本人、中国人读之，也如北欧人一般的能了解，能赞美。我们已在许多世界的名著里，见到我们在我们的名著里所不能见到的美的情绪、沸腾着的热情、现代人的苦闷，以及伟大的思想。”[23]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研究文学，我们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我们如

有了空间的或时间的隔限，那末我们将自绝于最弘富的文学的宝库了”，因为“文学是属于人类全体的，文学的园囿是一座绝大的园囿，园隅一朵花落了，一朵花开了，都是与全个园囿的风光有关系的。”[24]显然，这样的观念，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文学的全球化”。从这样的可贵的文化理念出发，郑振铎以中国学者的身份而热心于译介优秀的外国文学，就是合乎思想逻辑的了。

二是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意义具有科学的认识，从而牢固地形成了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郑振铎的文学兴趣本是从接触本民族传统文学开始的，而他在青壮年时期的职业活动除了一段时间任职文化出版机构外，又主要是在高校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另外他同时兼有藏书家的文化身份。这就无疑决定了他对民族文化文学的熟悉了解程度，远高于西方文学素养。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热心于把世界上的优秀文学引进到国内的同时，萌发也把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介绍给世界的想法，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何况，他本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创见迭出，加上当时的海外学者在描述中国文学传统的著作中出现明显失误的现象，也就合乎逻辑地刺激了郑振铎在从事中外文学交流的活动中，不仅仅是满足于单向的 “拿来”和“输入”，而且也勇于充满自信地向世界介绍、输送本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例如，说起世界文学范围内的著名文学家，他总是“荷马、阿斯克洛士、柏拉图、莎士比亚、李白、杜甫、关汉卿诸大家”并提，[25]而说起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成绩，他更是如数家珍般地予以充分的肯定，并且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中国人“如果不以广大的心胸去接受先民的伟大的成就，便是自绝于阳光灿烂，花木缤纷的文学园地。”[26]

以上两者的结合，无疑足以解释郑振铎之所以能够主动自觉地开展双向的中外文学交流活动的深层的思想原因。可以说，也正是在这一方面，显示了郑振铎的区别于“五四”时期的其他新人物的文化思想的光彩之处。

参考文献：

[1] 郑振铎：《世界文库-编例》。

[2][3]参见吴锦濂等：《文学研究会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福建师大学报》，1980 年第 2 期。

[4]参见：《文坛杂讯》，《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一号，1926-1-10）

[5]参见：蒲梢：《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收入张静庐编《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 年 12 月版。

[6] 郑振铎：《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新中国杂志社，1921 年 7 月版。

[7]商务印书馆，1924 年 3 月初版，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据郑振铎后来说：由于史料收集的限制，该书的最后一章（第十四章 劳农俄国新作家）系邀请瞿秋白代为执笔。（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

[8]是为王统照语，刊《晨报副镌》，1924-6-21。

[9] 郑振铎：《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三号（1921-3-10）

[10]转引自卓如：《访老诗人冰心》，《诗刊》1981 年 1 月号。

[11][12] 郑振铎：《世界文库发刊缘起》。

[13[14] 郑振铎：《评 Giles 的〝中国文学史〞》，收入《中国文学论集》。

[15] 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收入《中国文学论集》。

[16]《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朴社，1932 年 12 月刊行，凡 60 章，装订为 4 册，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修订本为 64 章；《中国俗文学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年 8 月，凡 14 章，分订为上下册。该书的内容具有专题性，也可以说是对前书的必要的补充。

[17] 收入在《中国文学论集》和《佝偻集》中的论文，在材料、内容、观点等方面大都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两书的相关章节有联系。

[18]参见日本《书志学》第 1 卷第 2 期（1933 年 3 月），转引自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年 3 月）

[19]近几十年来，有人依据鲁迅书信《致台静农》（1932-8-15）对郑振铎治学方法的讥评（所谓〝盖用胡适之法〞）而认定《插图本中

国文学史》一书缺乏〝史识〞。其实这一意见完全经不起推敲，笔者曾撰专文辩析了这一点。参见拙稿:《关于鲁迅讥评〝胡适之法〞的几个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01 年第 12 期。

[20]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三卷第 789 页。

[21] 郑振铎:《文学的定义》,《文学旬刊》第 1 期（1921-5-10）

[22] 郑振铎:《文学的使命》,《文学旬刊》第 5 期（1921-6-20）

[23] 郑振铎:《最后一页》,《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十一号（1924-11-10）

[24] 郑振铎:《文学大纲-叙言》。

[25][26] 郑振铎:《世界文库-发刊缘起》。